

# 趣说中国历史

(十一)

三思 主编

## 目 录

大同兵哗变 .....	1
前后七子 .....	5
吴门画派 .....	8
明北京城的建筑 .....	11
心学的创立 .....	15
泰州学派 .....	17
嘉靖崇道教 .....	20
严嵩擅权 .....	24
征剿河套 .....	28
蒙古南犯 .....	30
庚戌之变 .....	34
俺答封贡 .....	37
《永乐大典》的编纂 .....	40
《本草纲目》 .....	44
张居正改革 .....	46
戚继光抗倭 .....	52
宁夏之乱 .....	59
杨应龙之反 .....	63
矿税之害 .....	66
李贽反传统 .....	69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 .....	73
公安派的崛起 .....	77
“三言”、“二拍”问世 .....	81
章回体小说创作 .....	84
东林党争 .....	87
争立国本 .....	93

西学东渐 .....	96
《徐霞客游记》 .....	101
明宫三案 .....	103
徐鸿儒起义 .....	107
萨尔浒之战 .....	110
熊廷弼功罪 .....	117
宁远之战 .....	121
袁崇焕卫京师 .....	126
魏忠贤专权 .....	129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	136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	138
陕北起义 .....	140
郑芝龙受抚 .....	144
太监乱国 .....	146
张献忠起义 .....	150
李自成起义 .....	157
攻占北京 .....	162

## 大同兵哗变

大同是明代的边关重镇。嘉靖年间，这里不断遭到蒙古族军队的侵扰。为了巩固边防，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决定在城北九十里处建立“五堡”，作为抵御外族入侵的前沿堡垒。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五堡”即将建成，计划迁徙戍卒二千五百家开赴那里镇守，平均每堡驻扎五百家。消息传开，戍边军士议论纷纷。他们觉得，居住在距城二十里处尚且不断遭到侵扰而无宁日，现在要到距城近百里的“五堡”居住，若有敌入侵，谁来相救？于是表示宁死不愿迁徙。张文锦知道后，严令不许抗命。他派参将贾鉴对拒不迁徙者严刑处罚。此举招致了边卒的兵变。

哗变军士的头目是郭鉴、杨忠等人。他们杀死了贾鉴，聚集在焦山附近。张文锦怕叛兵与外敌取得联系，造成更大的危害，便招抚他们入城，随即捉拿首犯。郭鉴、杨忠等人见势不妙，鼓动叛卒焚烧了大同府门和都察院门，劫出狱中囚犯，事态进一步扩大。张文锦也遭到叛兵的追杀，逃到宗室博野王的住宅中。叛兵胁迫博野王交出张文锦并将其处死，还裂其尸首以泄愤。前总兵朱振被叛卒挟持出头作主，朱振提出三点：一勿犯宗室、二勿掠仓库、三勿纵火杀人，如果叛兵答应，便出头主事调解，否则宁死不从。叛兵表示愿意从命。

八月，朝廷决定由按察使蔡天佑继任巡抚，都督桂勇为总兵官，另派太监武忠镇守，同时派遣兵部侍郎李昆前往宣布赦免旨令。蔡天佑来到大同后，会同武忠、

桂勇等召集叛乱军卒宣谕朝廷旨意，局面稍有缓解，但是仍然不时有抢劫事件发生。总兵官桂勇处死了五十余人，其余均被赦免。然而城中依然人心惶惶，到处传言“必尽杀大同人”、“京营暨诸镇兵已驻近地，剿大同矣”等消息。时逢户部派进士李枝因公务来大同，遂被认为是传“密旨”来的。当晚众人又聚集出来，到李枝住处讯问究竟，李枝出来向众人解释清楚之后，人群仍未散去，他们杀死了据说是曾经提出诛杀叛卒建议的知县王文昌，纵火烧毁民宅百余家。第二天，又围逼代王府，代王怕有不测，率家人逃遁。巡抚蔡天佑一边竭力安抚众人，一边向朝廷请示解决方案。

十一月，户部侍郎胡瓚、都督鲁纲率军征讨大同叛卒，称“诛首恶，胁从不问”。大同城中军民心中恐惧，求蔡天佑出面保护他们。蔡天佑再次重申，“兵来惟诛首恶，胁从不问也。汝辈勿助恶即为良民，无事矣。”众人得此允诺人心稍定。总兵官桂勇设计擒住首犯郭鉴、杨忠等十一人，全部斩首示众。郭鉴的父亲郭疤子纠集胡雄、徐毡儿等人再次聚众作乱，围住桂勇的家宅，抓住桂勇，杀死桂家数人。蔡天佑与武忠赶来反复讲明道理，桂勇方幸免一死。蔡天佑处死了徐毡儿等四名首犯，郭疤子逃走，胡瓚想发兵追杀，被蔡天佑阻止，称“首恶即诛，余党釜鱼耳，易处也。”胡瓚遂班师回朝，被一些人上疏弹劾为“讨叛无功，逆党未尽得。”第二年二月，郭疤子纠集同伙数十人潜入城中，乘夜晚焚烧民宅。待天亮之后，蔡天佑擒住郭疤子等四十余人，全部处死。此次兵变终于被平息下去。

嘉靖十二年(1533年)，兵部议设总制重臣于大同，意在加强这里的守备力量。兵部侍郎刘源清被任命为总

制，都督永为总兵。十月，大同总兵李瑾建议在城外挖一道四十里长的濠沟，用来阻止外族的骚扰。刘源清赞同此议，限定三日完工。李瑾平素就十分严厉，此时为赶工期便不断严刑催促，士卒不堪忍受，终于又激起了兵变。哗变士卒杀死了李瑾，围住了巡抚潘的府第。潘跳墙逃脱后，向上言书：“镇将用法苛刻，兵悉变，请置勿问。”而刘源清则主张“即兵悉变，法不可废，请讨之。”他又在大同城中张榜告示：“五堡之变，朝廷处（罚）太宽。乃今稔恶戕主帅，天讨所必加者”。佥事孙允中希望刘源清不要动武，更不要旧事重提五堡兵变的旧帐，免得扩大事端。刘源清以为前次胡瓚“以兵不临城，致言者纷纷，吾不可更袭前辙。”刘源清的做法，引起五堡遗属的猜忌。他又派人搜捕乱党，而在被捕者的名单中大都为有功之士。各镇士卒抗拒捕快随意抓人，双方冲突升级。刘源清率军来到城下，大肆杀掠，永也带领军队来到城下。五堡遗属见状尽数哗变，他们关闭城门，拒城自卫，与官军对峙。潘、孙允中眼见无法控制局面，遂上疏军官妄杀无辜激起兵变的实情。刘源清也上疏称巡抚潘姑息逆党，致使镇卒与王师对抗。潘被弹劾、罢官。

十一月，兵部尚书王宪称“大同之变，非大发兵诛之不可。”辅臣张孚敬也同意此说。于是任命江桓为总兵，参政樊继祖为大同巡抚。樊继祖恐怕叛卒与外寇联合，决定自己单骑入城晓谕军民，平息此事。但这个建议被搁置。刘源清则一再上疏，“宗室，诸文武悉已从贼，实天欲弃此城矣。”朝廷有旨命其攻城。刘源清一面攻城，一面命人决水灌城。哗变军兵拒城顽强抵抗，官军攻城未果，双方相持不下。其间，叛卒与外族取得联系，鞑靼骑兵在其首领小王子的率领下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

正月大举来犯。平定大同叛兵的官军不得不分兵抵御小王子的入侵，永率军迎击鞑靼兵，结果作战失利，鞑靼骑兵在边关一带大肆劫掠数月后退去。

二月，刘源清请设总制御外，自己专事攻城。朝臣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指责刘源清贪功引水灌城，现在攻城未果，又引来外族侵扰，以致震动京师。主张罢去刘源清，另择他人处理此事。刘源清无奈，传话城中只处置首犯，其余概不论处。城中一些人闻讯决定作为内应，擒拿首犯，迎接官军。刘源清表面应承与之相应，但他出尔反尔，不守诺言，结果此计失败。朝廷罢免刘源清，任命户部侍郎张瓚代刘源清为总制。张瓚来到军中下令不得攻城，派主事楚书来到城下。城中叛兵表白说，“吾辈非杀将者，畏死自全耳！”楚书进入城中，声言“用兵非朝廷意”，众人皆呼万岁。楚书与哗变军兵达成协议，斩倡乱者，迎官军入城。当夜杀黄镇等二十四名首犯。巡抚樊继祖也进入城中，安抚人心。永仍想从中阻挠，散布流言“继祖伏兵为内应”。当夜又引起不安，樊继祖沉睡不起以示无事。张瓚命令官军后退二舍之外，自己来到城下，张榜晓谕，开仓赈济。城中军兵依次拜谒，以示臣服。兵变至此得到平息。

朝中得知兵变已经平息，降旨论定功过，核查兵变的原因及过程。不久，刘源清、永被捕入狱，被削籍降职。潘、孙允中官复原职。张瓚、樊继祖等有功者均有封赏。

## 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是明代中期形成的两个文人集团，他们先后在文学领域里掀起了一个历时久而又影响大的诗文复古运动。由弘治到万历，统治文坛达一个世纪左右。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廷相、王九思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主要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是由李梦阳首先提出来的。李梦阳，字献吉，号定同，甘肃庆阳人，弘治七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因上疏弹劾宦官刘瑾被下狱。刘瑾被诛，而起官江西提学副使。气节名震一时。“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著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与李梦阳诗文相交，初友善，后因见解歧异而互相诋诃。有《何大复集》三十八卷。为人处事“老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土风。”

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者老弗道。”李梦阳的代表性言论有：诗歌以盛唐为归，“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诗至杜甫达于高峰，“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如规，至方不能加矩”。而唐以后的宋诗“主理作理语”，更是破坏了诗歌的艺术特征，他认为“诗者，感物造端者也”。“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有感于外物还须达到心物相“契”，即所谓“心会相契，神契则音”，“随寓而发”。要使诗歌达到“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的艺术效果，

还必须通过“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的比兴、形象化的表现方法。关于文，则认为文至“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李梦阳最推重《战国策》的实录精神和优美文采，“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攻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勘为后世之榜样。李梦阳还推重贾谊之文，认为“谊文最高古。”何景明的诗文主张基本上与李梦阳一致。但也有一些见解是不相同的，甚至二人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李以文坛盟主自居，要求何氏舍己从人，制止其“入室操戈”，以巩固自己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李梦阳先有《赠景明书》，论述景明诗弊，劝其改步。不料何景明竟写《与李空同论诗书》与之相抗衡。其后双方又反复诘难，至景明不复答辩而止。（何先李十年而卒）。

李梦阳、何景明在复古这一根本主张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复古上。李梦阳偏重于摹拟古人行迹，“刻意古范”，即学古太似。而何景明则提倡复中有变，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应该自“成一家之言”，“自创一堂室，自开一户牖”，即学古不似。另一分歧是李重诗文档调、形式的摹拟，“铸形宿模（模），而独守尺寸。”而何则强调内在神情之摹，注重内容的重要性。主张声色为末，质实是本，不能离本就末。与此相关的，李强调字字句句以古为法，尺尺寸寸以古为法，而何则认为“法同则语不必同。”如此等等，比较而言，何在复古中还有些创新的意思，比李梦阳有较少的保守性。

李何所倡导的第一次诗文复古运动，对冲垮台阁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这种唯古是尚的主张和句窃字摹的恶劣文风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和抨击，其复古气焰也就渐渐地衰弱了。正当此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

袖的后七子运动步其前履，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前七子的主张登上了文坛。

后七子活动年代约晚于前七子四十年。后七子主将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嘉靖甲辰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顺德知府，后擢河南按察使。著有《沧溟集》三十卷。另一主将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丁未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山东副使。以父忤予被杀解官，复起累，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州山人四部稿》。王世贞与李攀龙共主盟文坛，时称王、李。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前后七子中，王世贞影响最大，学问最为渊博，他才高，位显，“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心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而这一运动的中坚则是七子中的另外几位文人，即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

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与前七子大致相同，都是“是古非今”论者。倡导诗之格调、法度，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李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他的诗尽以摹拟为能事。为文则“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王世贞持论与李攀龙完全相同。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还书勿读。”认为诗文都是愈古愈好。他自己的诗文连篇累牍，无不模拟。后七子中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榛，字茂秦，山东临清人，终身布衣。著有《四溟诗话》，后七子中他年龄最长，是七子结社初期的盟主。后来李攀龙声望渐盛，又论诗不合而终致割席绝交。实际上，后七子论诗的纲领性意见是谢榛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

古，而终非古也。”反对盲目地拟古，而主张汲取盛唐十四家的创作经验来作自己的诗。有些近于何景明的观点，提倡模拟中应有变化。前后七子其他成员论点也是大同小异。

前后七子掀起的诗文复古运动，雄踞文坛达一个世纪左右。他们不单纯是前后各七个人，围绕他们形成两个相当可观的文人集团。他们的力量很大，其复古思潮曾激起巨大的波澜，当时“学者翕然从之”，“推尊之者遍天下”。文体为之一变。应该说他们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对廓清“台阁体”的影响，纠正“萎弱”的文风方面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他们的复古模拟和形式主义的主张，却给诗文创作带来普遍衰退的严重后果，这是前七子始料所不及的。到了后七子王世贞的晚年才对自己倡导复古所产生的弊病有所察觉。当时，复古派的反对者已应运而生，一如一度“推尊之者遍天下”一样，“攻之者亦遍天下。”直到“公安派”三袁高举反复古大旗，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才彻底瓦解。

## 吴门画派

明初，属于宫廷绘画的“院体”居于主导地位，自成化到嘉靖前后，院画势力开始衰微。其时，苏州一带经济繁荣，各种工商业发展很快，直接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兴盛；并逐渐成为四方文人聚集之地，而吴门画派也因此应运而生。

吴门画派继承元季四大家画风，属文人画体系。创

始人沈周，长州(今苏州)人，世代隐居吴门。沈周一生家居读书，未应科举，绘画兼工山水、花鸟与人物。所作山水画多描绘南方山水及园林景观，反映文人生活的闲雅意趣，画法上承董源、巨然及元季四家，又参以南宋及明初诸家笔墨，融会贯通，刚柔并用，形成了粗笔水墨的新风格。早年多为小幅，四十岁后始拓为大幅，全面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的技法。成化三年(1467年)，绘《仿董巨山水图》轴，在狭长的尺幅中，作长林巨壑之景，布局丰满，不留空隙。另有《东庄图》、《盆菊幽赏图》、《牡丹图》等，皆为精心之作。

师事沈周而成为吴门派大家的有文征明。文征明，长洲人，出身仕宦，屡试未中，年长后才由诸生荐为翰林待诏，居官四年辞归，筑室玉磬山房，徘徊啸咏其间。与祝久明、唐寅、徐祝卿游，时称“吴中四才子”。文征明绘画造诣全面，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皆工。一生穷究画理，尽心实践，声誉远著，继沈周之后而成吴门画派领袖。文征明传世山水画精品有早年所绘《雨余春树画》、《烟江叠嶂图》、《寄傲图》等，中年精品更多，如《木榭煎茶图》、《惠山茶会图》等。晚年精细笔兼能，笔墨愈趋苍秀，《江南春图》为细笔杰作之一，粗笔一路则有《溪桥策杖图》等。文氏又精于人物画作与花卉图。

唐寅，吴县(今苏州市)人，少有才名，弘治年间中应天府(南京)解元，后入京会试，以考场舞弊案所累下狱，罢为吏。故此绝意仕途，筑室桃花坞，以诗文书画终其生。唐寅早年师从周臣，又追慕李唐、刘松年、马远，笃“院体”传统，吸收元四家“文人画”之水墨浅绛法，杂取众长，自创一体，于吴门画派中独树一帜。他的山水画多表现雄奇峻伟之重山复岭，及至楼阁溪桥，

亭榭园林，文人幽士的闲逸生活。山水画有《骑驴归思图》、《落霞孤鹭图》、《事茗图》等杰作。画中又以人物画居多，多描绘古今仕女生活和历史故事，所绘仕女形象造型优美，设色明艳，技法精工。

仇英，江苏太仓人，后居苏州。初为漆工，后改而绘画。年轻时因善画而结识许多名家，拜周臣门下，为文征明与唐寅等器识，曾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云观家中观识了大量古代名作，刻意临摹，技艺大进。他善于绘人物、山水、花草等，尤长于临摹。临摹以仿唐宋名家稿本居多，有著名的《中兴瑞应图》传世，仿南宋萧照。仇英绘画虽受“院体”影响甚重，但含蓄蕴藉，色彩淡雅，仍具文人画的笔致墨韵。如《连溪渔隐图》等清疏淡雅，画法工细，得赵孟兆页之墨韵。仇英《人物山水册》，是工笔重色人物仕女画的代表作，对清代宫廷画有较大影响。

吴门画派自兴起之后，特别是文征明的渊源关系，后来继起者甚多。文征明的子侄、学生成为知名画家的便有其子文彭、文嘉，其侄文伯仁，学生钱谷、陆治、陆师道、陈道复、居节、朱朗等，一时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传播甚广。明后期，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崛起，稍晚的程嘉遂、李流芳、卞文瑜、邵弓米等以“画中九友”著称，也同属吴门画派的文人画体系。

董其昌，华亭(松江)人。专长于画山水，出入于董源、巨然、高克恭、黄公望、倪瓒，融合变化，又尤致力于黄、倪。虽然他十分注重法古人传统技法，题材也较少变化，但非常注意笔墨的独特造诣，故画风能脱出巢袭，自成一体。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直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所

绘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多灵变，墨色干湿浓淡，层次分明，蕴蓄丰厚。董其昌又于绘画理论上倡“文人画”的“士气”，主张书画相遵，笔墨上追求“生”、“拙”、“真”、“淡”的趣味和效果。为标榜文人画而提出著名的“南北宗”之说，举文人画的南宗而贬行家画的北宗，对后代绘画理论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明北京城的建筑

北京是具有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名城，它由一个居民点，发展为边防重镇，以后又发展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在辽南京、金中都的基础上，元代最后发展成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九月十二日，明大将徐达率几十万大军攻入元大都，元亡。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决定首都由南京迁往北平。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下诏营建北京宫殿城池，分遣大臣赴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诸省，采集名贵高大的木材，作为建筑京城的原料。当时动员二十三万工匠，上百万民夫，以及大量的士兵，投入了营建北京的巨大工程。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阙告成，前后达十五年之久。永乐十八年十一月(1420年12月)，以迁都北京布告天下。永乐十九年正月(1421年2月)正式迁都北京。从此，北京就成为明代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嘉靖年间，对北京外城进行较大规模的建筑。这样，明代的北京城，从内到外，形成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重城的格局。明北京城外观呈“凸”字形。

紫禁城是北京城的核心，位于全城中心。自明成祖朱棣以后的所有明朝皇帝，就居住在这里，统治着全国人民。紫禁城四门：南为午门，北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墙四角有高大的城楼(又称角楼)，俗称九梁十八柱，三重檐，高二十七点五米，七十二脊，结构异常精巧，奇丽美观。紫禁城内的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皇帝的“唯我独尊”地位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主要宫殿，即前朝三大殿和后廷三大殿，都建筑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两侧对称地排列着许多组建筑群。明朝宫殿建筑呈东西对称或南北对称格局，这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前朝三大殿和后廷三大殿同在一条北京城之中轴上，并与南北两组三大殿相对称。在后三殿的东西两侧，有东六宫和西六宫，是众嫔妃居住的地方，排列整齐，东西对称。在东六宫正北，为乾清宫东五所，西六宫正北，为乾清宫西五所，都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排列整齐，东西对称。在中轴线上，左文华殿，右武英殿，左右对称。就整个紫禁城布局看，前三大殿和后三大殿在一条中轴线上，称为中路建筑群，其两旁又有东路建筑群和西路建筑群，大致东西对称。明代这座皇宫建筑群，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和独特风格，在中国建筑史上占重要地位。

皇城在紫禁城的外围，北京内城的中央。门六：南曰大明门，其东北角门曰长安左门，西北角门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北曰北安门，俗称厚载门(清代改称地安门)。

承天门(清初改称天安门，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前开辟了一个“T”字形宫廷广场，沿广场的东、西、南三面修筑宫墙，把“T”字形的广场完全封闭起来，这也

是皇城的一部分，其南端的大明门，为皇城之正门，明成祖命大学士解缙为大明门题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明代中央官署，绝大部分设在大明门以北，广场两侧宫墙外面。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宫廷广场和宫城联为一体，象征明朝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从端门到午门的中心御道两侧，东侧建太庙，是祭祀皇祖的地方(今为劳动人民文化宫)；西侧建社稷坛，是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今为中山公园)。在皇宫左建太庙，右建社稷坛，正好是中国古代“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但就其规模之雄伟宏大，是明代首创，远远超过了以前历代。

内城的北城墙是在元大都北城墙向南移五里的地方。新北城墙西段，从新开道街北端起穿过旧日的积水潭最狭的地方后，转向西南，到安民厂止，成一斜角，形成北京西北缺一角。东、西城墙是在元大都东、西土墙的基础上，用砖包砌而成。南城墙向南移二里多，也用砖包砌。内城周长四十里，四面共九门：

东面二门：东直门、朝阳门。

西面二门：西直门、阜成门。

南面三门：正南为正阳门、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

北面二门：安定门、德胜门。

北京内城九门内，正阳门内建成棋盘街，是明代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其余八门内，均有一条宽敞而平直的大街，均以各城门的名称命名，也就是说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的干道为中轴，重要干道多南北向，胡同多东西向。这些大街纵横交错，形成大大小小的“井”字街道，加上其左右两旁井然有序的胡同，使北京城像

一个整齐如画的大“棋盘”，这是明代北京街道布局的重要特点，具有城市建设规划的特点，也是中国古都传统建筑规制的特色。

外城的修筑，始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蒙古骑兵多次南侵北京，明帝朱厚为了加强北京的城防，决定增筑外城。原计划外城要包围内城四周，周长一百二十多里，因当时财力、人力不支，只修了环抱南郊、包括北京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的外城，全长二十八里。

城门七：

南面三门：中为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

东面一门：广渠门。

东北隅一门：东便门。

西面一门：广安门。

西北隅一门：西便门。

外城包入的居民区，街道弯曲、倾斜，街巷相互交错，与内城街道井然有序，形成鲜明的区别，这是由于明廷未经规划，加之当地商业繁荣、居民居住按自然地势发展起来的缘故。不过，有两条干道是比较宽阔平直的。一条是东西向，从珠市口到广安门为通衢，横贯全城。另一条为南北走向，从正阳门直抵永定门。

明代北京有一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它南起外城的正门——永定门，北至钟、鼓二楼。紫禁城内的“金銮宝殿”和中宫正殿就压在这条中轴线上，全长约十六华里。这么长的中轴线，纵贯全城南北，本身就是一个特点，所有中国现存的大城市都没有这个特点，就连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城——西安市，如果说有中轴线，以钟鼓楼为中心的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也远没有北京城的中轴线长。